

红旗下

风雨同舟

蒋明政◎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蒋明政◎著

风色雨声 红旗下

有人说人生是一台戏，有人说人生如一场梦，也有把人生说成一本书的。自古以来，人类在繁衍延续的历史长河中，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品味人生后都会以大致相同的感受在一阵叹息声中作出类似对人生的比喻或概括。一般说，凡是对人生发出感慨、作出概括的人，其生命的时段一定是接近或已经步入了晚年。现在轮上我了。在离开喧嚣的人群，脱离终日的劳累，远离矛盾纷争的环境后，我静享着余年。人到这时，我没有夕阳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风雨雨红旗下 / 蒋明政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220-08773-8

I. ①风… II. ①蒋…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1540 号

FENGFENG YUYU HONGQI XIA

风风雨雨红旗下

蒋明政 著

责任编辑	郑 红
封面设计	张冬雪
技术设计	古 蓉
责任校对	刘 静
责任印制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 //www. scpph. com http: //www. booksss. com. cn E-mail: scrmcbsf @ mail. sc. cninfo. 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5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4
字 数	417 千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220-08773-8
定 价	52.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前 言

有人说人生是一台戏，有人说人生如一场梦，也有把人生说成一本书。

自古以来，人类在繁衍延续的历史长河中，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品味人生后，都会在一阵叹息声中，对人生作出类似的比喻或概括。

一般说，凡是对人生发出感慨、作出概括的人，其生命时段都已接近或已经步入了晚年。

现在轮上我了。在离开喧嚣的人群，脱开终日的劳累，远离矛盾纷争的环境后，我静静地享受着余年。人到这时，我没有“夕阳无限好”的心态，更多是“可惜是黄昏”的遗憾。

人到晚年，一般都不愿展望自己未来。于是，无论是家人闲谈、同辈茶叙，还是独坐静思，那满脑的思维总是止不住地追忆着过去。如烟的往事，虽说酸甜苦辣、风雨雷电兼有，但现在细品起来，确也如梦似戏。而将这一台台戏与一个个梦用文字连接起来，就成了一本书。

我和我的同辈，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同度过了一个特殊的时段。我们出生在国民党统治的末期，紧接着又带着一身奶气，蹒跚地走进了新中国。那时，社会上将我们定位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

我们出生在旧社会，却缺少对旧社会的直接感受。而后来对旧社会的了解，则如同儿时所唱的一首歌——“我坐在高高的谷堆下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当然，也有不少社会的宣传和灌输。然而，在追溯我生命纹路的过程中，愈来愈清晰的，还是在红旗下跨过的桥，走过的路。

在离岗休息后的几年日子里，每当我回忆、梳理自己的过去，便发现我从人生的起点一路走来，无论风里雨里，沿途都充满了关爱和呵护，帮助和支持。这一切，无论是来自亲人、老师或同学，还是来自朋友、同事或老领导，一幕幕往事回味起来，常常使我陷入深深的眷恋和感激之中。可以说，我是在重温人生温暖的过程中写完了这本书。或者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对一切关心、帮助过我的人，表达自己的思念和感恩。

我们成长在红旗下，这就注定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轨迹与共和国的命运、状态必然重合。无论同代人之间具体的成长经历和状态有什么不同，其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以及物质生活有什么差异，都必然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由此，凡是追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不能不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1959—1961年的三年生活困难时期；也不能不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文化大革命”；更不能撇开“四人帮”倒台后，国家的拨乱反正和改革、振兴。所有这些，也正是本书涉及的内容。我之所以用文字将它回忆记录下来，不仅是为了让后人了解我们这代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也希望有助于后人分析研究影响我们这代人命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从中悟出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哪些是未来共和国建设征程中必须摒弃或防止历史重复的，哪些是应该珍惜、继承或发扬光大的，使我们能在未来的路上少一些不必要的曲折，增强改革和发展的信心。

尽管处于同一时代，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但具体到我们这代

人的每一个成员，也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这部回忆录，只是同代人成长过程中的个案。我无意也无法代表任何其他人。也正因为如此，如果一代接一代的人，在回顾、梳理自己生命轨迹的同时，都把属于自己的故事记下来，众多的故事凑在一起，不仅使得历史更加立体、饱满和鲜活，还能使历史更加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百姓，从而使历史更具真实性和完整性。毋庸置疑，与那些单纯依赖文献资料编撰的历史相比，那段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应该更具真实性，更有话语权。

50多年来，我们这批“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历经坎坷和灾难，与共和国的命运同行。当我们的国家在改革的号角声中进入历史的辉煌时期时，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我们则一批批含笑离开了岗位，犹如一大群退伍的老兵。

好在我们笑在了最后，面对的是日益强大的祖国，看到的是生活逐渐改善的人民。这最后的笑足以让我们感到欣慰和满足。

由于本书时间跨度大，涉及内容多，牵连人物广，难免在个别事件的时间确定，以及内容阐述的准确性上有失偏颇。对此，敬请批评指正。书中涉及的人物如有得罪之处，亦请谅解。别无他意，目的在于映衬当时的时代背景、印证事情的真实性。

2012年5月于成都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解放了	1
一、惨淡的家境	1
二、移居农村	4
三、我们分得了土地	7
四、贫穷但也快乐的童年	11
五、当农民的日子	15
六、我的小学	21
第二章 沸腾的年代 艰难的生活	29
一、“反右”斗争和“大跃进”年代的初中生活	29
二、艰难的高中生涯	37
三、母亲得了水肿病	44
四、高考前后	48
第三章 我的大学	53
一、刚进大学的感受	53
二、我的学习生活	56
三、参加“四清”运动	59
第四章 乱世“文革”	67
一、“文革”初期的校园	68

二、当“文革”冲破了单位、部门界限	83
三、盲流的日子	90
四、枪口下的冤魂	103
五、弹片横飞	107
第五章 军垦淬炼	115
一、极“左”思潮中的锻炼生活	115
二、准备打仗	124
三、双抢“战役”	126
四、忆苦思甜 活学活用	133
五、迎“八一”	135
第六章 走向高原	138
一、走进大山	140
二、为“活学活用”先代会写材料	142
三、复课闹革命	147
四、初入政坛	152
第七章 难忘的公社岁月	156
一、接到调令	157
二、饥饿的农民	159
三、为了群众不挨饿	167
四、石鸭子大队	173
五、“学习大寨呀，赶大寨”	174
六、公社班子的故事	180
七、“我们的书记是大学生”	192
第八章 雪域高原	200
一、初到马尔康的感受	201
二、马尔康也有人反击“右倾翻案风”	203
三、天边出现了曙光	208
四、跟随杨岭多吉工作的日子	210

第九章 省府大院	219
一、80年代省府工作环境和条件	/ 221
二、80年代省府工作和生活感受	/ 224
三、身着中山装的省府领导们	/ 227
四、80年代省府的秘书工作	/ 233
五、家庭的变故	/ 251
第十章 80年代四川改革与发展印象	256
一、改革先锋——四川人!	/ 256
二、改革在思想解放过程中深入	/ 258
三、改革初期的四川发展概况	/ 270
第十一章 起步时期的四川政府法制建设	277
一、接受新任务	/ 277
二、四川省90年代前半段的法制环境	/ 279
三、全省行政机关掀起学习《行政诉讼法》高潮	/ 282
四、90年代的四川行政执法状况	/ 286
五、法制建设起步时期的行政执法与党风	/ 293
六、法制建设起步时期的四川基层情况	/ 296
七、行政执法的规范和整顿	/ 300
八、法制建设起步时期的政府立法	/ 315
第十二章 担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时期的工作感受	320
一、我耳边至今回响着“四川雄起”、“‘全兴’雄起”声	/ 323
二、三星堆文物在美国巡展与比尔·盖茨父母家离奇的家庭装饰品	/ 331
附 录	340
关键在于发展农业生产力的	/ 341
——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体会	

新老干部的团结是顺利进行改革的保证	/ 343
——学习《陈云文选》有感	
实行对外开放要清除小农经济思想影响	/ 345
关于企业外部条件的一点看法	/ 347
粗放经营是对土地的最大浪费	/ 349
浅议四川省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 351
控制投资规模 为改革创造良好环境	/ 356
实行股份制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	/ 362
试论转变政府职能	/ 364
八年深入改革 发生十大变化	/ 366
——对八年来四川改革、建设的回顾	
浅析四川近期经济发展速度	/ 370
企业承包企业是一种重要的承包经营形式	/ 374

第一章 解放了

一、惨淡的家境

那已是 60 年前的事了。

1949 年 11 月 3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攻克重庆后，其 36 师挥师西进，于 12 月 7 日解放了位于川东南的荣昌县城。

那时，我的家住在荣昌中学旁边的一个巷道口。家里只有母亲、姐姐和我 3 人。

解放军进入县城的那天上午，我从门缝中看见好多头戴红五星、身穿黄布棉袄的人，他们扛着枪、抬着炮、排着队路过我家。其中，有一支几十人的队伍停在我家门前的小坝里，一个背短枪的人朝着队伍里说了些什么后，他们就解散了，有的坐在地上一边唱歌一边擦枪，有的还在嘻哈打闹。

没看多久，那个背短枪的人从门缝中发现了。他朝着我走来，蹲在门前地上向我“小鬼”、“小鬼”地喊，还在不断朝我招手。看到这情景，我有些害怕，迅速依偎在身后的姐姐的身上。

姐姐拉着我磨磨蹭蹭地去到他的身边。他朝着我微笑，抚摸着我的头问：“小鬼，几岁了？”

姐姐代我告诉他，5 岁。

他指着自已左胸前的那一小块白布问我：“这上面的字你认识吗？”我对他摇头，同时看着我姐姐。我知道姐姐能识字，她还教我认字呐。姐姐在我耳边轻声说：“中国人民解放军。”

那个背短枪的人问了很多，大多是姐姐在回答。他问我爸爸叫什么名字，我还是摇头。但当他问我长大后想做什么时，我大着胆子告诉他：“姐姐叫我

长大了，要多找钱给我娘！”

我身边立即响起一片笑声。

这以后，我常常对母亲提起爸爸，询问家里过去的事情。

我母亲告诉我，我父亲出身在四川泸县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念过私塾，后来还上过外国人在重庆办的一所洋学堂。由于多少受了一些西方文化的影响，他立志兴办实业。1925年春季，在家庭的支持下，他与一位同伴带着盘缠，以及铁锤、铁镐等探矿工具，驱马赶往大凉山。谁知刚进山就被绑票，土匪令同伴带信回去：两个月内拿不出1000块大洋，就撕票！

经历了这次磨难，父亲的家境开始衰落，从此他不再提办实业了。他十分内疚，带着母亲告别了家乡，于次年到达重庆拜一位名老中医为师。母亲便在药房学制药。

学徒期间，由于父亲天资聪慧，勤学好问，深得师傅的赏识。出身于泸县雨坛乡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的母亲，干起活来从不言苦怕累。就在当学徒的那些年月，父亲不但教会了母亲识字，还让母亲学习写毛笔字。

1932年夏季，父亲出师了。在师傅的帮助下，他在重庆两路口开店行医。随着就医者增多，店堂逐步扩大，堂面上挂出了一块黑底白字的匾牌——积德堂。

自1937年11月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重庆后，日本飞机不停地对重庆狂轰滥炸。“积德堂”在1941年6月的“两路口惨案”中，被日本飞机炸成了一片废墟。1941年7月，逃过劫难的父母带着哥哥和姐姐移居到荣昌县城。此后，他就住在荣昌县城里行医。

父亲行医，有他自己的理念和方式。他只开处方不卖药。每张处方一块银圆。由此，县城的人都习惯地叫他“蒋一块”。母亲说，他的这个绰号，后来还传到了农村。

那时，父亲白天诊病处方，晚上与母亲一道制药。什么丸药、水剂药制了不少，品种也多。但制成的这些药，他是不会卖的。富人来了，一张处方走人；家境一般的人来了，酌情减少处方费；实在太穷的病人，不仅免收处方费，还要免费送药。

父亲的这种行医方式，招来社会上的闲言碎语，就连母亲也常常与他发生争执。母亲说父亲是一根牛筋。你要说他处方费收高了，他说爱来不来自便，他是在削富济贫；你要说他看人收钱不公平，他就说怨不得他，怨就怨世道不公平；你要提醒他，这样下去，今后来看病的全都是穷人，他说，穷

人的命也是命！

在父亲的店堂里，贫困人群前来就诊的确是越来越多。其中，好些人都是几十里外赶来的贫苦农民。不过，富人们，包括县衙门里当官的也有来的，只是脸色不好看，有的还发牢骚，骂人。

那时，虽说扣除行医成本，父亲赚的钱不是很多，但一家人不愁吃不愁穿，日子还算好过。

每当母亲对我摆谈到这些，都会发出长长的叹息。她说，那个时候，她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日子早晚都会不安稳。

这以后，父亲的店堂逐渐成了黑白两道索财、出气的地方。今天黑道的人来伸手，明天官府的人来“执行公务”。一个店堂两股势力欺压，谁能受得了？

1946年的一个夏天，驻扎在荣昌县的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当官的舅子，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衫子，伙同两个随行，大摇大摆地来到了积善堂。

听母亲说，这个舅子姓赖，他家原来是一个大户，全家三儿一女。几个兄弟都喜好鸦片，不弃不离。就这样，三杆烟枪把家产烧得烟消云散。

来者在兄妹中排行老二，生性刁横。他走到正在为病人处方的父亲面前，死皮赖脸地要“抽头”（即从处方收费中抽钱），说是二爷瘾来了，要急用！由于父亲坚持不给，便惹得赖老二怒火中烧。他一边“砰、砰、砰”地拍打桌面，一边破口大骂，还把桌上的处方笺抛撒在地上。

赖老二的这番举动，惹怒了在一旁候诊的人们。特别是人群中那些护送病人来就诊的，更是一个个指着赖老二骂。其中，有两个抬滑竿送病人的年轻农民，因指责赖老二“大白天抢人”，遭到赖老二和同伙的毒打。在旁围观的荣昌中学的学生和一些路人，“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他们也加入了除恶行列。经过一场厮打，赖老二和他的两个打手鼻青脸肿地跑了。得胜方满脸喜悦，还说，老子今天出了口恶气！

气倒是出了，麻烦却惹大了。第二天上午，警察来了。他们说父亲挑动学生闹事；父亲的行医方式是笼络人心，煽动百姓对政府不满。就这样，生拉活扯地把父亲甩进了监狱。

这下母亲慌乱了手脚。她一边到县衙门喊冤，一边又到处托人说情。一位过去常来看病的警察告诉她，这世道除了钱，其他都等于零！

为了救父亲，母亲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值钱钱的家具也全卖了，只剩下一张床，还有一张吃饭用的桌子和一个木柜。

1947年初快过春节时，身着长衫的父亲，蓬松着一头乱发，神志恍惚地走出了监狱。当他走进家门，看见这凋零破败的家，一口气上不来，就倒在了地上。

他走了！留下母亲，丢下哥哥、姐姐和我，去到了另一个世界。那时我才两岁。

父亲去世后，一家4口的生活重担压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年，母亲起早贪黑地帮人缝补浆洗、做布鞋卖，艰难地支撑着我们这个家。实在没办法了，姐姐只好辍学。为了哥哥能继续读书，母亲到处托人求情，好不容易才让哥哥进了不要钱的省农校（注：这所学校，是抗战时期的难民学校，解放后改为四川省畜牧兽医学校），那里食宿免费。

母亲常常对我讲起哥哥在省农校的事。说他穿的衣裳，全都是同学穿了不要的。满身的虱子咬烂了他的皮肤，常常因痒痛得太难受了，跑回家守着娘哭。

哥哥在省农校读书期间，荣昌县的地下党活动频繁。一次，哥哥和几位同学帮地下党贴传单时，被警察发现。从此便杳无音信。所以，当1949年解放军进城时，我的家只剩下了3口人。

每次母亲对我讲起这些辛酸的往事，都忍不住地流泪。

二、移居农村

解放了，看见过去那些作恶多端的人要么跑了，要么被枪毙了，县衙门里全是一批新面孔，母亲好像出了一口气，笑容也多了起来。那时，我第一次听见她哼唱的歌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刚解放时，我的家乡并不安宁。跑出城的国民党军队残渣余孽和土匪搅和在一起，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动了疯狂反扑。在那些年月里，内江、荣昌、大足、永川等地的反动武装力量串通一气，垂死挣扎。据《荣昌县志》记载，仅1950年的1至4月，荣昌县县城、吴家镇、仁义镇、安富镇、路孔乡等地，均反复遭到上千武装匪徒的猛烈攻击。

大概就在这段时间吧，一天，扎着两根麻花辫的姐姐跑进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母亲：荣中校的学生出事了！

母亲牵着我，在姐姐的带领下，急匆匆地来到了学校操场。操场上，整齐地摆放着两排用白布覆盖的遗体。遗体旁，亲人们呼天抢地地哭诉，旁边还站着不少老师、学生和解放军。

在我的印象中，听在场的大人们说，这些学生是跟随解放军下乡征粮时，夜晚被土匪包围了住所牺牲的。

母亲向停放遗体的地方走去，每走到一具遗体旁，都要揭开遮面的白布，仔细地端详死者的面容，不停地用衣袖擦抹眼泪。

我问姐姐，娘咋个要哭呢？姐姐后来告诉我，娘在哭死了的学生，也在想念哥哥。

荣中校学生出事后不久，一天上午，一个女解放军和几个穿中山装的人来到我家。他们和母亲摆谈了很久，有时大家在笑，有时则沉寂。

至于那次谈话的具体内容，母亲后来断断续续地告诉了我们。她说，那位解放军妹子给她说了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也给我们划定了家庭成分。目睹我们寒碜的家，又了解到母亲会做庄稼活，就决定让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俩到农村去，参加土地改革，分一份自己的田地。

1950年底，我们搬家了。门外停放的一辆架架车上，牢牢地捆绑着我们家的全部家当。母亲告别了送行的邻居，出发了。

走出县城，我们上了马路。这就是成渝公路。那时的成渝路，全是坑坑洼洼的黄泥地面。路上除了稀疏的行人和那偶尔出现的牛拉车，什么也看不见。

我们走了20来里路，到了小镇“梦子桥”。这个小镇，是广顺乡的一个乡场，大家也叫它广顺场。小镇的街道成Y字形，街宽不过两米。那时这里居住的有居民，也有不少是农民。我家当时在广顺场马路边的一家染房里。房东姓万，当地人叫他万染匠。走进染房，有一小块空地，上面架着粗大的木棒扶架，扶架下摆放着滚压布匹的大石滚。面对石滚的左侧，顺着墙壁是一排类似老虎灶的灶头，大灶用来煮染布匹，两个小灶是两家各自做饭的地方。石滚背后两三步处有一个小天井，天井东端间隔一步便是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我们就住在这间屋子里。西端是房东住的一间大屋。万染匠那时没有孩子，夫妇俩勤劳朴实，用母亲的话说，两家人相处得还算和睦。

我们来到广顺场时，这里正在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清匪反霸”目的是通过清剿国民党武装残余力量，惩治社会恶势力，稳定社会环境；“减租退押”作为土地改革的前奏，意在尽快减轻贫困农民的负担。据《荣昌县志》记载，根据1950年9月川东人民政府公署第一次政府委员会的部署，荣昌县实施了按农民与地主的土地“租约”或当年约定的土地租额，一律以约定租额的25%缴纳地租；与此同时，勒令地主退还佃农租佃土地所



今日的广顺场街道，与解放初相似。（摄于2009年8月）

缴纳的全部押金。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隔三岔五的，母亲和姐姐都会带着我，到距场镇不远的“箩兜井”那边去看枪毙土匪。枪毙人当地俗称“敲沙罐”，他们把人头比喻为“沙罐”（沙罐本指用陶土和上煤灰、沙子烧制成的陶罐），而那时枪毙人都是朝着头部开枪的。

箩兜井那边，通往曾家山煤矿的公路旁，几十个五花大绑的土匪跪成一长串。山坡上，到处都是围观的人群。解放军对那些跪着的人一个个点名后，又说了些什么，接着就是一阵扫射。枪声一响，跪着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倒在了地上。

那时一到枪毙人，最让人恶心的是一个“叫花子”。他姓张，当地人叫他“张叫花”。年龄可能四五十岁，身高不到一米五，体形干瘦，脸面垢黑，留着山羊胡须，瘪嘴。

每当要枪毙人了，他就像过节一样。虽然他身着又脏又烂的长衫，双脚拖着一双烂布鞋，但也潇洒。他走出离染房不远的一个小破庙，提着一瓦壶烧酒，一路上哼着小调，一颠一跛地走向刑场。枪声响后，他便在死人堆里挑人，随即便盘腿坐在选中了的死人身旁，一只手伸进死人的烂脑壳里抓着脑花吃，一只手把壶里的酒水往嘴里倒，边吃喝边“咿咿呀呀”地摇头乱唱。

他吃饱后，嘴巴周围黏着死人的骨渣离开刑场，我和一群小玩友们就追着他跑。我们一边在地上捡石子打他，一边反复地齐声吼叫着大人们教给我们的两句话，“张叫花、是妖怪，人肉当成下酒菜”，直到把他赶回破庙。

三、我们分得了土地

1950年6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经历了短暂的减租、退押后，我的家乡掀起了“斗地主、分田地”的土地改革高潮。

土地改革前的荣昌县，全县共有农村人口416752人，耕地面积715613亩。而占农村人口6.4%的地主家庭，却占有总耕地面积的53.89%（注：数据引自《荣昌县志》）。类似这种土地资源分配不公，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激起过中国农民无数次的武装起义，包括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现在，广大农民世代梦寐的土地就要到手了，其在土地改革中所焕发出的热忱，是可想而知的。

那时我的家乡，到处是斗地主、分田地的热气腾腾的场面。在那些日子里，我看见的是大人们的一张张笑脸，听见的都是分田分地、斗地主的那些事。当时，我有几个同龄的玩友，听说哪个村要斗地主了，就手牵手结伴而去。大家都才五六岁，有的还穿着“开裆裤”。我们第一次参加“斗争大会”时，玩伴中有人问：地主是个啥样子？有的说是像鬼，有的说是像妖怪。到了现场才发现，他们也是人！

当时斗争地主的场面，一般都有用木板临时搭建的小台子。台顶上横挂着写有大字的红色条布，台上站着几个穿中山装的“工作同志”。台下，紧靠台子的边缘，面对人群站着一排身穿长衫的人，一个个都低着头，有的还戴着黑色的“瓜皮帽”，他们就是地主。

面对台子，密密麻麻地站着一大群人。大人们手里一个个都拿一根长篾签，篾签上黏着三角形的小纸旗，红、黄、绿色都有，纸旗上还写有毛笔字。在这些人中，男人们的头上有的围裹着白色、黑色的布帕，有的光着头。他们都穿着补疤重补疤的长衫子，多数是赤脚或穿草鞋，很少看见有穿布鞋的。老婆婆们的后脑勺一个个都挽了一个“髻髻”（注：圆形的发髻）；虽说那些扎着麻花辫的姑娘们有的穿着浅花衣服，但衣服上也缝着其他颜色的疤块，看上去很刺眼。还有的姑娘就像我们男娃娃一样打着赤脚。

那时参加斗地主的人，比广顺场的“逢场天”（注：当时的四川农村，每隔三五天就有一次“赶场”，北方人叫赶集）还多。斗争大会开始了，我们